



唐宋词与唐宋文化

刘尊明 甘松 著

T a n g S o n g C i Y u T a n g S o n g W e n H u 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上架建议:古典文学

ISBN 978-7-80729-352-1



9 787807 293521 >

定价:32.00元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唐宋词与唐宋文化

刘尊明 甘松 著

Tang Song Ci Yu Tang Song Wen Hu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刘尊明,甘松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29-352-1

I. 唐… II. ①刘…②甘…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018 号

书 名 唐宋词与唐宋文化

著 者 刘尊明 甘 松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352-1

定 价 32.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前 言

近现代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元发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生成空间和发展前景。比如,文化学的兴起,系统论的出现,以及文化学、系统论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运用,便产生了一门新兴的艺术科学——艺术文化学。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直至新世纪以来依然方兴未艾。

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音乐文学样式或诗歌体裁,“词”在唐五代发生发展至宋代繁荣兴盛的整个历史进程及其艺术特征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规范和陶冶,同时,作为文化的特殊载体,唐宋词也积淀了传统文化的丰富蕴涵,映照出时代文化的五彩风姿。对唐宋词及其发展史作文化学的观照、探索、描述和阐释,既是对唐宋词研究作深广拓展的一种新尝试,同时对整个词史和词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也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艺术文化学”的方法论启示

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正像文学创作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风貌一样,文学研究也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方法和格局。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还局限在

直观感悟或散点透视的传统格局和单一方法上,缺乏科学系统性和理论思辩性,而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在努力克服古典式研究的缺陷的同时,却又滋生了诸如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等新的弊端,那么,随着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我国当代的文学研究正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控制论、信息论、考古学、传播学、计量学、接受美学等各种知识领域和科学方法,都争先恐后地介入文学研究阵地,而且也开始被不同程度地尝试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中“文化学”的方法也颇为引人注目。

所谓文学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就是将文学纳入文化的视野中来进行观照,或者说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现象。

文化的起源极早,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文化。“文化”一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也都出现得较早;在中西历史典籍中,对文化现象的记述也都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然而,“文化学”和“文化史”作为独立的科学分支的出现和发展,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把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之中,自然要以文化学的产生和流行为前提。

追溯起来,似乎应该说,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里,文学艺术就已经开始被置放于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了,它被看做文化大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子系统之一,同文化的其他子系统处在合乎规律的相互关系中。例如在黑格尔那里,艺术便被视作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而同哲学和宗教处在一种合乎规律的相互关系中。同时在19世纪的法国,女作家史达尔夫人和文艺理论家丹纳等人,也试图“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有何种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俗和法律有何种影响”^①,认为

① [法]史达尔夫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引言”,转引自 [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文学现象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种社会文化因素所共同决定的^①。但是此后的大部分资产阶级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却并没有正确评价康德、谢林、黑格尔以及丹纳等人在这方面的建树,而多是只从艺术本身去考察艺术,使它脱离同文化的相互接触而不同其他文化现象发生关系。

马克思利用康德和黑格尔的文化结构论作为出发点,又以系统方法(辩证法的具体表现)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作指导,进一步阐述和确定了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原始方案)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总的文化结构的概说:首先展开地说明物质生产的特征;然后论述对世界的理论(思辨)掌握的方式,即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最后划分出掌握现实的第三种方式——“实践精神”方式,意识形态的艺术形式和宗教形式被归入这种方式。马克思把神话定义为“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界^②,表明了艺术同神话在起源上的联系;同时又把人类艺术发展的规律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相对比。这样,马克思把文化整体划分成物质—实践的、实践—精神的、精神—理论的这样三个基本层次,而艺术即被视为第二层次的基本代表。

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有关艺术与文化系统之关系的经典论述,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们的进一步阐扬与发展。在中西方现当代的文艺理论与文学研究中,人们关注和偏重的多是“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社会”等方面的考察,或者是另一极端的所谓“纯本体”研究,而对“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则多有忽略。

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卡冈在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的工作中,逐步提出了“艺术文化学”的理论构想。他这样界定说:“研究整个艺术文

① 参见[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化,在它的所有子系统的统一和相互作用中,在它形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在它于文化里发挥功用的特征中研究它”,“可以把这门科学叫做艺术文化学”^①。通过卡冈的系统阐释,我们可以对艺术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获得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的体认:

首先,文学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或单一的客体,我们必须把它纳入艺术创作活动的整体系统中来考察。艺术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是将一些基本的人类活动诸如改造活动、认识活动、价值定向活动、交际活动等,融为一体的有机的系统整体。这个系统整体包括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知觉三个子系统。因此,艺术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艺术作品,还应该研究艺术活动这个系统整体。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归附于艺术活动系统一样,艺术活动也应该归附于包容它的更广阔的系统——艺术文化。卡冈把艺术文化理解为“人类艺术活动的方式和产品的总和”^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艺术价值、艺术批评、艺术文化的科学研究——艺术文化便是由这五个基本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每种类型的艺术文化的内部组织旨在保障最有利的条件,以发展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创作方法和优先发展对于该文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那些艺术活动领域。”^③因此,从事文学艺术研究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必须涉及艺术文化这个系统。

其三,“如果艺术活动归附社会艺术文化,艺术文化既赋予艺术创作,又赋予艺术知觉以具体的社会历史性质,那么,艺术文化本身也归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④根据马克思对整体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及其对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我们认为,艺术文

① [前苏联]卡冈《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收入其《美学与系统方法》一书,凌继尧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9页。

② 《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87页。

③ 《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98页。

④ 《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79页。

化乃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一个局部层次或子系统而存在的,它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其他两个子系统(物质文化层次和精神文化层次)是不能相混的。因为人的艺术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物质完整性”,即将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因此定型于艺术活动周围的艺术文化,便成为既区别于精神文化又区别于物质文化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化。卡冈将艺术同整个外部环境或被视作整体的现实的关系,概括为由五个方面——艺术与自然、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艺术与文化、艺术与艺术——组成的系统,并通过与其他各种关系的比较,来考察艺术与文化的特殊关系。艺术既形象地反映现实,便具有同现实的所有基本部分的联系,但是它同文化的联系具有特殊性。因为艺术是文化现象,它归属于文化,而人创造它,自然为此提供自己的材料,社会则确定艺术创作的方向。艺术同文化的这种特殊联系,取决于它在文化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人类的几种基本活动在艺术活动中融为一个整体,由于这种融合,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同于文化的其他各个部分,它不是片面的而是完整地代表文化,与文化同形。因此,对于每种类型的文化来说,归属于它的艺术是该文化类型独特的模型,是它的形象“肖像”^①。

作为一门对广义的艺术和艺术文化做完整系统的理论研究的新兴学科,“艺术文化学”如何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问题,不是笔者所关注的课题和范围,但是将艺术纳入文化系统中来考察的理论构思,则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启示。我想把这种文化学的方法论启示概括为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在艺术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整体系统中,来考察和描述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与规律;

第二,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广阔空间中,来发掘和观照

①《文化系统中的艺术》,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273页。

积淀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信息与内涵。

二、唐宋词与唐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构想

实际上,从20世纪上半个世纪开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已经有人开始尝试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较早的探索者便是闻一多和陈寅恪先生。闻一多将汉代建安五年(200)至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凡550年的文学划为“门阀贵族文学”,指出“盛唐之音”乃是门阀贵族诗歌的最高成就;又将唐代天宝十四载(755)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凡1100多年的文学划为“士人文学”^①。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纳入到中国文化的嬗变的系统和轨迹中来进行考察,将中国封建文化模型划分为门阀贵族文化与士人文化两大类型,与之相应的中国古代文学也被划分为两大类型。陈寅恪在历史研究及文化史的研究中,运用了“以诗文证史”的文化历史主义方法,如他在研究韩愈一首诗时写道:“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一文,足以阐明长安与河北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即指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一带渐显胡化趋向,生活于长安的士人有野心而不得意者,往往舍长安而北走河朔。这实际上是涉及有唐一代文化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②。此外,如以元稹、白居易、杜甫的诗歌来参证唐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皆有建树。不仅如此,陈寅恪还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法来研究唐代诗歌,在社会历史和文化史的特定环境中来考察诗歌创作,如《元白诗笺证稿》所取得的成就便是例证。这种“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

^① 参见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

^② 参见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法。此后,程千帆、傅璇琮先生考察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①,孙昌武、陈允吉先生考察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等^②,皆属于对文学的文化化学研究的成功尝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从事古代小说、戏曲和诗歌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一时形成一个不小的热潮。但是回头审视这段学术史,我们发现,虽然取得的成果是可喜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对各体文学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幅度和进程都还较为有限,尤其是在古代诗词的研究领域还显得较为薄弱。

我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她的诗歌。因为几乎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文化都是从诗歌开端的,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诗歌的关系非常悠久而深远,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前半期,诗歌的发展被推上了繁荣鼎盛的最高峰,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文学和民族文化的奇珍异葩。因此,对中国古代诗歌史做文化学的观照与考察,应该是更有空间和前景的。

首先,笔者正是在上述这种文化学方法论的启示下,和古代文学研究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实践的背景下,萌发对唐宋词做文化化学研究的构想的。

其次,引进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唐宋词的构想,也是由唐宋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身所提出来的。词起源于隋唐之际,经中晚唐至五代十国渐趋于发展兴盛,至两宋达于繁荣鼎盛的高峰。词的出现和繁荣,不仅给中国古典诗歌带来了新的艺术形体和新的审美风貌,作为鼎盛时期的“宋词”甚至被后人誉为与“唐

① 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参见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诗”、“元曲”鼎足而立的“一代之文学”，而且也给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理论问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一门与传统“诗学”相区别的独特学科——“词学”。词学研究绵延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从20世纪末年开始，当代词学研究者正纷纷做着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工作，有的做着古代词学研究的考察与梳理工作，有的则致力于描述和总结20世纪词学研究的得失与利弊。我们发现，作为已经积累了近千年历史的“词学”学科的主体对象，唐宋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累累成果，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薄弱环节，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研究的方法也比较单一。比如对个体作家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大家和名家，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没有得到关注和开发；相对于作家研究而言，对群体、流派、词体和词史的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唐宋词的文化特征、审美特性的揭示还不够深入，对唐宋词的发展演变和传播接受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心理的考察也不够系统，等等。因此，将唐宋词作为一个艺术整体而纳入到唐宋时代的艺术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宏观系统之中，来考察和揭示它发生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应该说是使唐宋词研究向纵深开拓的一种必然要求。

其三，对唐宋词做文化化学研究的构想，也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唐宋词作为词史和词学的主体部分和有机整体，它既具有区别于宋以后作为一种新型格律诗体而存在的词体文学的属性，也具有区别于传统的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它的综合艺术的特性。也就是说，唐宋词是唐宋时代的流行歌曲，是唐宋时代的音乐文学。如果说单独的音乐或纯粹的文学最充分地揭示了它们在精神文化中流转的过程，建筑和实用艺术表现了其他艺术所难以达到的物质文化特征，那么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典型则具有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属性，从而“造成了戏剧在对文化的关系中的特殊‘代表资格’”^①。卡冈把

^① [前苏联]卡冈《在统一的关联中：论舞台艺术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117页。

“语言—造形和音乐—造形的表演创作”放置于他所建构的艺术文化结构形态的中心“地带”^①，“因为其中精神能动性和物质能动性（心理能动性和形体能动性）获得平衡，这种平衡符合它们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那种性质。”^②应该说，作为整体看待的音乐文学或歌词艺术，唐宋词也属于这种“表演创作”的范围，它融音乐和诗歌为一体，与音乐和舞蹈相配合，以歌唱表演的形式来加以呈现和传播，这就使得作为歌词艺术或音乐文学的唐宋词，具有了单纯的音乐或单纯的诗歌所不能达到的体现和折射文化整体特性的功能和容量。因此，任何封闭的、单一的、分割的研究方法和格局，都不能完整地揭示唐宋词的文化功能和发展规律。于是由研究对象在对文化关系中的这种特殊品性所决定，也就必然要提出对它做整体系统的文化学的考察与研究的要求了，即把唐宋词置放于与唐宋时代艺术文化的其他子系统、其他艺术形式和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之中，同时也纳入到唐宋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来进行观照与探索了。

笔者主要拟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展开对唐宋词与唐宋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或者说是致力于完成这样两个主要方面的任务，即：

第一，考察唐宋词的发展演变与唐宋文化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致力于考察唐宋词在唐宋时代的几个主要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空间中发生、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情形，力图揭示唐宋文化对唐宋词的发展演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发掘唐宋词中所包含的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内蕴。具体而言，即通过唐宋词这面“特殊的镜子”，来观照其中所映现的传统文化的“图像”和时代文化的“形象”。

①《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95页。

②《在统一的关联中：论舞台艺术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收入《美学与系统方法》，第117页。

三、对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关系研究之概说

以上是笔者对唐宋词与唐宋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一个总体构想,主要是从学理性和方法论上来加以思考和阐释的。但实际上“唐宋词与唐宋文化”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它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在是太丰富、太广泛了,以我们浅疏的才学和有限的精力恐怕是难以全面完成和实现的。于是,笔者在这个总体构想之下,又选择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层面和视角,来展开对唐宋词的文化学的观照和考察。以下略做概述。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至第六章,考察唐五代词与唐五代文化之关系。既对唐五代文人词的发展历程与唐五代文化嬗变的关系进行了宏观的历时态的考察与阐释(第一章),又对唐五代敦煌民间边塞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专题的微观的发掘与探析(第二章),还对唐五代词与唐五代宫廷文化、城市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共时态的分层次的描述与探讨(第三至第六章)。第七章至第十章,则考察宋词与宋代文化的关系,以及将唐宋词与唐宋文化贯通起来加以观照,主要侧重于从几类重要的宋词题材或唐宋词题材所对应的宋代文化或唐宋文化的不同层面来进行考察与描述。首先,对宋代“宫廷词”与宋代宫廷文化、宋代“僧词”与宋代佛教文化、宋代“祝寿词”与宋代礼俗文化进行专题的分类考察与共时态研究,致力于探讨和描述以上三类宋词题材与宋代三种不同文化层面的关系及其文化特征(第七至第九章);其次,选取唐宋词中的“闲逸词”这类长期被忽略的题材,来考察其与唐宋时代的休闲文化、隐逸文化之间的关系,挖掘唐宋闲逸词所表现的审美特征及其文化意蕴(第十章)。

虽然限于能力、时间和篇幅,我们对“唐宋词与唐宋文化”的考察和探索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从理论上和结构上来看也还不够系统和严密,但我们努力想使自己所选取和涉及的视角、层面和

内容,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涵盖性和创新性。全书虽然主要以文人词为主体来进行文化学的观照,但也兼及敦煌民间词;虽然以分类的共时态研究为主线,但也兼及宏观的历时态考察;有关唐宋词与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关系虽有学者涉及,但仍有拓展的空间,本书在这些方面也力图做出一些深化;至于在敦煌边塞词、唐宋宫廷词、宋代祝寿词、唐宋闲逸词这几类题材的研究上,学术界多有忽略,笔者则倾注了较多的心血,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进行观照与阐释,期望对唐宋词的研究做出一定的创新与突破。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既参考和吸收了前哲和时贤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见解。

首先,从宏观的研究构思上,笔者较鲜明地阐释了对唐宋词做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即基于对唐宋词特殊的功能体性特征的认识。正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对唐宋词做文化学研究的构想,乃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整体上看,作为音乐文学或歌词艺术的唐宋词,也属于那种“表演创作”的范围,它是一种融音乐、诗歌、舞蹈、歌唱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具有了单纯的音乐或单纯的诗歌所不能达到的体现和折射文化整体特性的功能和容量。因此,由研究对象在对文化关系中的这种特殊品性所决定,也就必然要提出对它做整体而系统的文化学的考察与研究的要求了。这种观点和认识,是笔者进行唐宋词与唐宋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努力贯穿在笔者整个研究进程之中。

其次,从整体的理论思维上,笔者较深刻地体认和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唐宋词的发展史从总体上讲乃是一个文化演变与文化选择的历史进程。这一核心观点,在本书第一章对唐五代文人词发展历程的文化观照中,得到了较细致的阐释和印证。词在初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向上、开放发达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显得极为冷落滞后,反而却在中唐以后尤其是晚唐五代社会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这实际上是由唐代文化

的类型特征及其演变所决定的。笔者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这种文化演变通过作用于创作主体的人生道路、审美情趣、文学观念、艺术消费等各个方面,从而最终实现对于词的发展历程的选择和制约作用。这种认识和观点,对于考察宋代词史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应该也是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其三,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上,本书主要以唐宋文人词为考察对象,侧重于从不同的文化层面来考察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意蕴,其中既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对唐宋词研究做出了一些突破与创新,也提出了一些较有个人见解的学术观点。如第二章论唐五代敦煌边塞词的文化意蕴,既补足和加强了词学界过去对边塞词研究多所忽略的这一薄弱环节,又从唐五代西部文化和军旅边塞文化的视角,对唐五代敦煌民间边塞词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蕴进行了考察与揭示,反映了唐五代词在西部边塞民间的创作和流传情况。又比如第三至第八章,分别考察了唐五代词及两宋词与宫廷文化、城市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通过对唐宋词在唐宋文化这几个主要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空间中发生发展及其文化特征的考察与探讨,笔者试图从总体上揭示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有音乐歌唱的地方,就有流行歌曲的存在;作为音乐文学和流行歌曲的唐宋词,它的生命和足迹既充溢于唐宋文化的各个层面,而它的发展演变和审美特性的形成也受到各个层面的唐宋文化的哺育与影响。

具体到本书各章的研究,又各有不同的创获与心得。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与道教、佛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可喜的成果,具体到唐宋词的研究虽也有所涉及,但还不够深入细致。本书第六章、第八章,考察唐五代词与唐五代道教文化、宋代僧词与宋代佛教文化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深化,主要体现在对唐五代词所反映的道教文化意蕴、宋代僧词所表现的佛教文化意蕴,进行了更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挖掘。第五章论唐五代词与唐五代儒家文化,这是前人很少论到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整个词史和词学的发展都表现出一条对儒家文化由背离到回

归的清晰轨迹,这在唐五代词中已有初步表现。唐五代词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表现为一个既相背离又相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儒家文化对词这种从民间新兴的音乐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阻碍作用,而晚唐五代词的发展兴盛又明显地表现出对儒家文化传统规范的突破与背离,或者说是在儒家文化趋于低潮或衰歇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带有一些与儒家文化传统不尽相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和传统文化心理又不可能不给唐五代词的发展以影响,这不仅在唐五代民间词中有所表现,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文人词与儒家文化难以割断的内在联系,和向儒家文化传统的初步回归。”这些认识和见解,虽然只是一孔之见,却是笔者用心体会所得出的。

本书的第三章、第七章,论唐宋宫廷词与宫廷文化的关系,是笔者用力较深的部分。对唐宋词中的宫廷词,过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学术界往往将它视为思想内容的糟粕而加以否定。笔者通过考察则认为,唐宋宫廷对唐宋词的发展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创作空间,而宫廷文化对唐宋词的内容题材的表现和审美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笔者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描述宫廷音乐文化繁荣发达的情景,阐释宫廷音乐文化娱乐生活对歌词创作的需求和促进,也以大量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概括宫廷词所承载的唐宋宫廷文化的信息,所反映的唐宋宫廷文化的审美特征和思想意蕴。本书对唐宋宫廷词与宫廷文化的研究,期望能对唐宋词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有所补充和加强。

第九章论宋代祝寿词,既是对宋词题材研究的一大拓展,也是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唐宋词的一个较典型的个例。对宋词中的祝寿词,过去的词学研究也极为忽略,偶有涉及,也只是论述个体作家如辛弃疾的寿词创作等,缺少宏通的视野和系统的研究。笔者在运用电脑检索手段统计宋代寿词创作数量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然后从礼仪文化和风俗文化的视角来全面考察和分析宋代寿词创作的历史渊源、发展兴盛的文化环境,尤其着重阐释了宋代寿词所表现的生命意识。这一章不仅加强了宋词题材